

杭州文史资料

第二辑

2001/

杭州
册

政协杭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目 录

“浙一师学潮”的影响·····	董舒林 (1)
宗文中学办校经过·····	钟毓龙遗作 (11)
记杭州私立安定中学·····	陈宪清 (30)
烽火漫天话“联高”·····	王新吾 陆楨口述 钟永水整理 (43)
在辛亥革命中牺牲的杨哲商烈士·····	杨文群 (49)
抗战胜利后杭州“接收”情况·····	沈松林 (52)
抗战初期国民党余杭县党部概况·····	董品璇 (59)
一九四八年蒋经国在上海搞限价·····	赵一云 (66)
我参加了国民党杭州市参议员的选举·····	余泽生 (76)
《新光》邮会、邮刊、邮展琐语·····	张包子俊 (78)
记杭州两次报纸展览会·····	钟韵玉 (92)
杭滩和清音的淘汰·····	钟韵玉 (95)
回忆省立贫儿院·····	楼达人 (98)
杭州江干木行业的历史概况·····	陈瑞芝 (101)

“浙一师学潮”的影响

董 舒 林

浙江第一师范是全国最早响应五四运动的学校之一，在运动的全过程中，它以鲜明的旗帜、饱满的热情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而震动全国，因而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与北方的北京大学相媲美。

“浙一师学潮”是五四运动在浙江的继续和发展，是整个五四运动在浙江的组成部分；它对浙江乃至全国的政治和文化，都有巨大的影响。浙江第一师范的旧址（今杭州一中）解放后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决不是偶然的。

—

如前所述，“浙一师学潮”既然是五四运动的发展和组成部分，那么，其爆发的基本原因应与五四运动发生的原因相一致，毋容赘述。但其导火线，两者却有区别。“一师学潮”是在一师遭受种种迫害、尤其是校长经亨颐被免职这根导火线上引燃开来的。

经亨颐从两级师范末期担任校长到蝉联一师校长，前后任校长近十年之久，他在学生中提倡“人格教育”——即道德品质教育；他提出“与时俱进”的口号作为办学方针。经

氏本人身体力行其人格教育，堪为学生之师表。且平时亲近学生，深受学生爱戴；学生与他相处，多则五年，少则一年，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学生视他如尊长，他视学生如子弟。故教育厅突然一纸命令，免去他的校长职务，这使学生无论是从感情，或是从理智，都是接受不了的。尤其是经亨颐提倡新文化、进行教育改革，既顺乎潮流、又适于师生之要求，经氏之去职，无异于新文化和教育改革在一师的破灭。因而要在一师维护新文化和进行教育改革，非要坚留经亨颐任校长不可。这一点，一师全体师生心中是很明白的。

在五四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一师学生之所以表现最突出、斗争性最强、态度最坚决，其原因除校长经亨颐的积极赞助外，还有教师陈望道、学生宣中华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分子的领导。再者，与一师学生的家庭出身较为贫苦亦不无关系。一师学生大多来自农民、小手工业者、小职员、小教或私塾贫苦教师的家庭，这种小农、小资产者的家庭经济，在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朝不保夕。他们的家长节衣缩食把自己的子弟送到这个免交学费和伙食费的学校来求学，无非期望自己的子弟毕业后能获得一名小学教师的职位，以求最低的生活保障，使免受饥冻之虞。然而，在当时，这种最低的生活待遇也不容易求得。这就难怪学生要打破现状，改革现状。此外，在“一师学潮”发生的前十年，在两级师范时期，鲁迅、许寿裳等教师曾开展了一场反对反动校长夏震武的称之为“木瓜之役”的斗争，当年这场斗争的参加者之一的夏丏尊，就是“一师学潮”新文化运动中的“四大金刚”之一。

“木瓜之役”对“一师学潮”，不可能没有影响。鲁迅曾

说“一师学潮”是第二个“木瓜之役”。

在斗争的过程中，一师师生步调一致、相互支持、共同斗争，全国各界与杭州学联所属各校学生的支援，都鼓舞与推动了一师学潮的深入开展并坚持到胜利。

促使一师师生积极投入斗争的因素当然还可以找出一些，但主要因素不外上述这些。

二

运动的发展过程，按其性质来说，基本上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从五月到暑假，这个阶段可说是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交织在一起，既要求废除日帝强加于我国的廿一条和其他一切不平等条约、惩办卖国贼，即“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又要提倡国货和抵制日货。第二阶段是暑假之后，运动中心转入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和新文学的新文化运动中去。

由于校长经亨颐和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人对新文化的倡导与推动，广大师生在运动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崇拜“德先生”（Democracy）与“赛先生”（Science），他们提倡“劳动神圣”和“社会改造”，反对旧道德和旧思想。他们确实做到了“非孝”、“废孔”和“共产”。凡此种种，必然引起了反动统治者的恐惧与仇视，于是演出了查办学校、解聘“四大金刚”、开除“浙江新潮社”的学生，免去经亨颐的一师校长职务、解散一师、武装包围一师、用武力强迫学生离校、最后酿成流血惨案等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戏剧

来，到1920年3月29日，达到了这个多幕剧的高潮。在一师师生的英勇斗争和各界的声援下，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

三

从“五四”到“浙一师学潮”胜利结束，在这长达十一个月空前激烈的政治与思想斗争中，一师的师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和革命实践的考验与锻炼，促使许多人进一步走上革命的道路，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培养了一批早期的党团员和干部。

教师陈望道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已从他的老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那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这场斗争中，他深切地体会到要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必须要有新的思想武器，这武器便是马克思主义。因此在寒假中，他回到义乌老家清水塘，全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据一师老校友的回忆，在1920年上半年，《共产党宣言》的石印本或油印本曾在部分学生中流传。同年夏，该书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正式出版。这是我们目前发现的《共产党宣言》在我国最早的全文译本。毛泽东同志曾说：“有三本书在我的思想上影响特别大，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最正确的解释之后，我便从没有动摇过。一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用中文印行的马克思主义的书。”陈望道本人于四月接受陈独秀的邀请到上海担任《新青年》编辑。

《浙江新潮》的骨干、一师学生俞秀松、施存统、傅彬

然和周伯棣等四人，在第三期《浙江新潮》出版之后，于1919年年底离开杭州，于一九二〇年一月上旬到达北京，加入了“北京工读互助团”，《浙江新潮》也就停刊了。三月，工读互助团解散，施存统和俞秀松回到上海，俞秀松参加《星期评论》社编辑部工作，经陈望道的介绍，俞认识了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陈独秀——他是在年初被迫由北京南下到上海的。同年五月一日，陈独秀、陈望道、施存统等人在上海澄衷中学举行了有五百人参加的我国第一次纪念“五一”的集会。会后，陈独秀、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李达、李汉俊和沈玄庐等七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即中共上海发起组^①。俞秀松参与起草党纲工作。

1920年6月，新建立的党组织派施存统到日本东京去建立党小组。

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员中，以俞秀松的年纪最小，党决定由俞秀松负责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我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创建，由俞秀松任书记。一师学生中在上海第一批入团的有华林、谢文锦、郭静塘和叶天底等人。1922年5月，全国十五个地方团组织的代表在广州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施存统被推选为团中央书记兼团中央机关报《先驱》的主编。

教师胡公冕于1921年10月在上海由陈望道、沈玄庐介绍加入中共，次年春，胡公冕和一师学生谢文锦、梁柏台等人经过海参威抵达黑河，与半年前先期到达的一师学生俞秀松、何景亮（汪寿华）、华林等会合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①《党史研究》第一期1980年出版。

俞秀松在莫斯科出席了第二次国际少共代表会议，回国后，继续参与团的领导工作。他于1922年春来杭州建团（C·Y）。一师学生入团的有宣中华、徐白民、赵炳焕、许志行、汪志清等人，由俞秀松兼书记。

汪寿华于1923年在苏联加入中共，1925年从苏联回国，“五卅”运动爆发后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任中共上海兼江浙区区委执常委并代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1927年3月22日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被选为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和上海总工会委员长。赵炳焕为上海总工会秘书。

宣中华于1923年底由中共上海兼江浙区委书记徐梅坤介绍入党。大革命期间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委会常务委员兼国民政府浙江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又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内中共党团书记。在以他为首的中共浙江地方党的领导下，对浙江革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徐白民（麟书）曾任中共上海兼江浙区委执委会委员，并任党开办的第一个书店——上海书店的经理。

华林于1922年由陈独秀、罗亦农介绍加入中共，曾任中共杭州地委宣传委员、上海执行部长江巡视员等多种党内职务。

叶天底（叶天瑞）曾与张闻天共同创建中共苏州独立支部，任书记，后因病回故乡上虞，又创建中共上虞县支部，任书记。

胡公冕回国后参加军队工作，后任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许志行在大革命期间由中央委员毛泽东介绍入党，被派往国民党中央党部任机要秘书。

总之，一师师生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与考验，纷纷走上革命的道路，其人数是相当多的，现在没有确切的材料可资说明，但粗略估计参加中共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人数，不下于数十人，至于赞助并投身于革命的左派群众则更多。他们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对统一战线的建立，对工农运动和北伐战争的进展，对各地中共组织与国民党左派党部的建立，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中许多人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发动的“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光荣牺牲了，成为名垂千古的英烈。

“五四”运动与“一师学潮”，也教育了一师和杭州的许多进步学生，使他们认识到工农力量的伟大，促使他们开始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工农运动的发展。

一师学生在出版《杭州学生联合会会报》（一师学生主编）、《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校友会十日刊》和《浙江新潮》的过程中，经常与“浙江印刷公司”的印刷工人接触，彼此由熟悉而结成朋友。被推选为杭州学联理事长的一师学生宣中华常与印刷工人谈天，告诉工人是工人养活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的道理，宣中华还给工人讲过课，内容是为什么要反对廿一条不平等条约和日本军阀侵略成性的本质。

1920年创刊的《曲江工潮》，是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出版的工人报刊，是浙江省工人自己办的第一张报纸，他们请一师的学生钱珉莘、魏金枝和陈乐我等为编辑，写文章的也大多是一师的学生。化名慎予、义璋、耿仙、更仙的，实即是严慎予、钱蒂南和钱珉莘等一师学生。该报代表工人

的利益，揭露了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的罪恶，号召工人团结起来打倒资本家和资本家的爪牙——工头，以摆脱工人被奴役的地位。

一师学生还帮助印刷工人于1921年办了个工余补习学校。钱畊莘、俞大同等都在该校义务任教，宣中华曾去作过演讲。1922年10月，印刷公司工人倪忧天出席莫斯科“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由宣中华邀请倪忧天同去的。宣中华当时是以杭州学联代表的身份去的，倪是以杭州工人协会的名义去的。

1921年五月下旬，杭州千余理发工人因不堪资本家店主的压迫，举行了一星期的罢工。在罢工之前，他们找印刷公司工人帮忙，印刷公司的工人介绍他们去找一师的学生。据魏金枝的回忆，一师的学生化了装，扮成理发工人的模样，参加理发工人的队伍，前往省议会请愿，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传单《杭州理发工人全体泣告书》，大约也是一师学生的手笔。这是杭州工人的第一次罢工，这次罢工是取得胜利的。

一师学生也参加了农民运动。1921年下半年，当时的共产党员沈玄庐叫李之华在肖山衙前创办“农村夜校”，一师学生宣中华、徐白民和唐公宪等都是该校教员。他们一面教书，一面组织农民协会，拟定农会章程和宣言，在1922年底，他们领导了肖山衙前乡及附近农民一、二千人举行了一次抗捐、抗租的示威活动。肖山农运是我国现代农运史上的先声。

“一师学潮”斗争的胜利，不仅捍卫了新文化运动的胜利成果，而且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和革命斗争的深入发

展。

《浙江新潮》被反动当局查禁之后，一师的学生又办了与《浙江新潮》性质类似的报刊——《钱江评论》，于1920年1月出版了创刊号。第九期该刊发表了《浙江学生联合会答俄国劳动政府书》，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主动声明废除帝俄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一事，表示了衷心的感谢。此外，一师和杭州的青年还出版了《进修团团刊》（杭州进步女青年主办）、《浙江第一师范十日刊》、《浙江第一师范自治会会刊》、《浙江第一中学校学生自治会半月刊》、《浙人》、《责任》及《曲江工潮》等等报刊。他们都是抱着“不怕势力强权、横逆降临”的精神，继续战斗，继续宣传新文化与新思想。

经亨颐在被免去一师校长之职后，拒不接受省视学之职，愤而离开了杭州。他有感于在公立学校办学，完全受制于官僚而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因而募款在自己的家乡上虞白马湖建立“私立春晖中学”，请了一师的师生夏丐尊、杨贤江、丰子恺、刘质平以及朱光潜、刘熏宇等人为教师，在春晖中学继续贯彻一师的革新精神，把春晖中学办得生气勃勃，造就不少人才。1923年，经亨颐在两级师范的同事张宗祥任教育厅长，请经氏到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任校长。经氏就任时，除请了春晖中学的一些教师以外，还请了共产党员华林去当教师，安置失学青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华岗、李宪仲等人在校学习。经氏就任后，继续传播新文化，采取了许多“与时俱进”的进步措施，如允许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校内开展建团活动，1924年在全校举行列宁追悼会，等等。因此终于为顽固守旧势力所不容，旧派发起“驱经活动”，进步

的青年学生就来个“留经活动”。“驱经”与“留经”的斗争持续了近二年之久，经亨颐终于在1925年10月离开了省四中。他在四中的时间虽短，但成绩却是显著的，四中约有十分之一的学生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四中成为宁波地区的革命摇篮、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华岗（华少峰）成为四中学生的杰出代表之一。一师、春晖、四中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是新文化的播种者。

一师的学生在1920年4月取得“一师学潮”的胜利后，立即乘胜追击，于同月发起“驱齐运动”。杭州学联理事长宣中华采用了正确而巧妙的策略，联合了杭州各界的大多数，利用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终于仅费了二个个月的时间，即将反动省长齐耀珊赶出了浙江。

1925年杭州各界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的斗争，是在一师毕业生宣中华为首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进行的。一师及一师前身省一中的广大学生积极地参与了这一斗争。

总之，“五四”运动和“一师学潮”，教育了一师广大师生，培养了不少革命者，其中一批优秀者参加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在杭州、在浙江和全国一些地方，参加了历次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他们发挥了积极的骨干作用，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宗文中学办校经过

钟毓龙遗作

清代中叶，杭州有义塾三：曰元善，曰辅仁，曰宗文。一八六一年，兵燹，三塾皆毁。元善、辅仁二塾，其历史情形，均无可考，而宗文独存。兹将该校办校经过，分述于下：

一 创办义塾

创办人周补年，名士涟，嘉兴新丰镇人，当清代乾嘉之际，见镇上儿童，多因贫寒不能受教育，乃于镇之四隅，先后设立平林、盐溪、尚文、里仁四塾，收贫寒子弟，延师教之，而不取其费，所谓“义”也。旋来杭城募捐，有绍歧者敬之，慨捐百金，其他亦多乐助者，于是赁屋定安巷，再创一塾，名曰“宗文”，此为“宗文”之始。其录取学生标准：曰孤，曰寒；孤而不寒，寒而非孤者，皆不入选。塾设“仁”、“义”、“礼”、“智”、“信”五斋，斋延一师，课徒十人，以程度递升，“信斋”为最低级，“仁斋”为最高级。学生入塾，凡笔墨书籍饮食等，皆由塾供给，但自备衣被而已。月有考，董塾事之塾正主之；季有试，敦请杭之绅士来主之。程度高者，试以诗文，低者试以背诵及书法等。绅士

于其优秀者，予以奖赉，或实物，或现金，故生徒入塾肄业，终岁不费一钱，优秀者且可得奖赉以资辅助。每当岁科试之年，凡程度可以应试者，皆令其参加，一切车舆保结各费用，及入泮后学中老师之挚仪等，皆由塾支付。不入泮者，仍还肄业，以待下届。其入泮者，则于参谒宗师之后数日，塾中备肴酒款之，乃袱被出塾，犹今学校之毕业也。然虽出塾，而关系不断，如能乡试中式，则公车北上之费，塾中仍酌予津贴。周先生本非素封，力任五塾之经费，虽罄其家，塾用仍益不继，乃与次子恒旦出门募捐，风雨寒暑无间，遂遭疾。时海宁朱裔，号蒙泉者，以行医居杭，为先生治疾。知其病所由，出资助之，并为之劝募膳米，凡来就诊者，悉不受酬，而劝其移助宗文，于是先生之疾以瘳。学使者李宗时，为题“疗学图”以彰之。同时杭人徐步鳌砚农，与其弟秋如两孝廉，闻先生疾，偕往候之，劝以医药。先生慨然曰：塾用且匮，敢为一身计耶？塾无自备之屋，月租万不能缺，又无经常固定之费，师生数十人之膳食，吾一日不出募，则馁矣。两徐慨然，愿以祖遗包衙前之房屋三十六间为赠，于是由定安巷移往，嗣后塾舍系自有，每月无须再负担租金矣。同时魏仓伯广文，与在籍之俞侍郎某，又为之请于当道，飭下盐运使，劝各盐商，于每引中捐钱若干，以供宗文之用，于是常年固定经费始有着，不必再行出募捐矣。周先生定塾规严，生徒出自贫寒，亦多能刻苦自奋，故为封建王朝造就一批统治人才。尤著者为冯小亭培元，道光时殿试，以一甲第三人及第；又有周伯荪兰者，以二甲第一人及第。余于一九二一年，接任校事，检查旧储什物，发现此二人匾额，“探花及第”四字匾额系直写，“传胪”匾

额则横写，想当时皆悬之外厅，以为塾生鼓励之用者。科举废后，乃度藏之耳。日寇陷杭，校为伪组织所据，胥毁之矣。

按：周先生有自著《义塾始末记》一册，今南京图书馆中尚有之。其所载当更详实，各事年月，亦必记载，惜道远莫致，不能以为依据也。冯周二人之成名，皆在道光时，其它成名者尚有几，亦无可考。一九二五年，嘉兴计仰先宗型，来长教育厅，亦新丰镇人，余访以周先生后人，兵燹之后，更历多年，竟无知者。

二 义塾复兴

清乾嘉时，杭人王见大文诰，长于诗，尝取苏东坡诗集注释之，颇称精审，世所称王注苏诗者是也。自岭南解组归，筑宅皮市巷，于宅之南，辟一园，即名曰“南园”。园中浚深池，名曰“文明”。池之南，累土叠石为山，而筑阁其上，名曰“星带”，殆以坡前偏植书带草之故。阁外悬有联曰：“岂有文章惊海内，好栽花木待春风”。此联或系改义塾时之所为，而非王先生之旧。阁前乔木参天，至今犹有存者。池之北，为四面厅，颜曰“韵山堂”，同治间，嘉兴沈蒙叔景修补书之，谓当时斯园文宴，与皋庾两园比盛也。一八六一年兵燹，王先生后人，全家死池中，屋已无主，而尚完好，当局拟以为“忠义祠”。其时杭之士绅，丁竹舟申，丁松生丙，沈辅之映铃，与义塾旧生周伯荪兰等，正谋恢复“宗文”，而苦无适当之塾舍，闻其事，谓“忠义祠”何地不可建，似以归之“宗文”为宜，乃合词请于当局，拨

归“宗文”，此为“宗文”在皮市巷之始。

按：王见大先生之墓，在西溪东岳，先生无子孙，而塾中既用其屋，故于地主房主，不能不有以报酬，除墓地之税，由塾完纳外，每岁春秋二季，更备祭品，遣人至墓祭扫，至改学校后犹不废。胜利归来，墓已倾圮，余为修葺之，并请邑人高鱼占时丰题其碣曰：“清诗人王见大之墓”。一九五三年，政府令该处之墓，悉数迁徙，今校长崔炳章，又为移葬之，然祭扫之事不复举行，以后恐将迷其外，而不知其情形矣。

同时，各士绅又合词请于当局，拨助基金，于是由藩司、运司，合拨制钱四万五千串（注一），分存各典生息，而义塾于是成立。其时杭之绅富，如大商人胡雪岩等，皆有捐助，或月捐，或季捐，多少不等。

义塾既复兴，经费宽裕，乃复建包衙前旧址之屋，出租而收其息。会计员黄某，亏负塾款，以大浒衙之房屋作抵。此二者，皆为塾之产业，至今尚在。其后经费益裕，于五斋之外，再设一斋，名曰“外义”。王夔石文韶（注二），杭州最后之宰相也，自湖南巡抚旋里，又捐巨款，于是又增设一斋，名曰“外信”，收学生十二人，是为义塾之极盛时期。

义塾复兴后，一切规制，悉遵前此之旧，设正副二塾正，以董其事，月薪各制钱八千文，犹今之校长也。会计、庶务员，月薪各六千文。塾师束脩，以仁斋为优，月十二千文，其余递减。正月二十日开塾，十二月二十日闭塾，各有程仪，端午、中秋、年终，各有节敬，均二千文。每斋师生十一人会食，膳食之费，每人每日各六十文。惟每师之前，

特备较精美之饌二小簋。夏日下午，各师皆供给点心。凡此数目，余披阅同治时所遗之帐册而得之。其后改串为元，物价渐昂，各数目亦逐年增加矣。

按：昔时课学生作诗，必先教之辨平、上、去、入四声，相传某日，塾师教学生四声，正在历举“天子圣哲，何以报德”之际，适斋夫送点心馒头来，塾师即指谓各生曰，如此馒头，“冰冷气出”，即是四声；一学生信口而言曰：

“随你乱说”，师初怒其侮慢，继悟亦是四声，颇嘉赏之。此为塾师供给点心一证，亦为义塾时代之一轶闻，故附记之。

塾生进退，与塾师进退，皆两塾正主之。当时无所谓招考，皆先有人介绍说项，为之登记，有缺额时，召该生来，考其程度，分插某斋而已。至于塾正进退，与塾务之兴革，则由管理义塾之绅士主之，与官府往来接洽之事，亦管理绅士任之。此等绅士，大都由复兴之绅士，推举递嬗而来，犹后之校董也。以余所知，金少伯先生曰修，谭复堂先生猷，陈蓝洲先生豪，杨雪渔先生文莹，樊介轩先生恭煦，皆尝任其事。塾正，以张寅伯先生景云，高龚甫先生保康，在任最久；张正而高副，约有三十年，至改学校始离去；二人之家，亦均在皮市巷也。塾生无成进士者，登贤书者则颇多，其他亦多有以树立于社会。辛亥革命，参加者四人：一为顾子才乃斌，身在行间者也；一为汪曼锋嵌，第一任杭县县长也；一为钟卜丞枚（今改名丰玉），有《杭州光复记》一篇自述之；一为马夷初叙伦。

星带阁上，供有创办人周先生及复兴义塾诸先生之牌位，岁由塾中春秋致祭，以资纪念。一九三二年，旧塾生钟